

七日评中评

点评\正言

1 ■近年来,国际市场已经把原油期货当作一种类似股票和债券的金融产品,大批并不直接使用原油的投机交易者进入市场,采用金融市场上低买高抛的手段进行炒作,原油衍生品交易也像金融衍生品一样让人眼花缭乱,资本市场上的大户串通、对倒交易等操纵价格的行为也泛滥成灾。因此,油价的暴涨暴跌,用实体经济中商品供求关系的理论已经无法解释。(6月7日《广州日报》,原评人:周俊生)
——提防国际倒爷的“万金油”功夫。

2 ■人们总是要求别人“讲真话”,但是很少有人告诫听话的人要“听真话”。其实,有的人所以讲假话,也是因为有的人喜欢听假话。讲话的人又往往是下级,下级一般要看上级的脸色行事说话,顺着杆儿往上爬。媒体也罢,写家也罢,总在“讲话人”身上做文章,似乎本末倒置,有失公道。(6月6日《人民日报》,原评人:高深)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痍;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3 ■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多种经济结构并存造成了社会结构的日益细分,不同社会阶层也表现出特点各异的文化需求,因此,主流文化遭遇一定的挑战。要转变主流文化传播的话语方式,用大众文化的“壳”,包装、传播先进文化的“核”。(6月5日《重庆日报》,原评人:夏学奎 向勇)
——水往低处流才能汇入大海。

4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方也好,推行15年免费教育也好,推行12年义务教育也好,都不一定是国家发达、地区发达的结果。关键是要该省的省、该地的地,不能给自己花时永远不差钱,给孩子们的教育花时永远不够钱。(6月4日《北京晚报》,原评人:苏文洋)
——教育,政府你大胆地往里投!

5 ■下基层既要“人到身入”,也要“心到神入”。各级干部以怎样的态度和方法下基层,是影响下基层实际效果的重要问题。态度不同、方法不同,效果往往大不一样。(6月3日《解放日报》,原评人:戴者春)
——别让下基层变成“吓基层”。

6 ■从表面上看,舆论的确影响了司法。问题是,它到底是怎样影响的呢?是影响了警方的侦破能力呢,还是影响了法官的理性判断?如果是通过影响上级官员,然后由官员来对执法和司法部门进行影响,这明明就是“官员审判”,为什么要叫做“舆论审判”呢?司法和舆论,一方不可能去审判另一方。而对两者的权威都能损害的,是过界的行政权力。(6月2日《潇湘晨报》,原评人:长平)
——对于“舆论审判”,身正不怕影子斜,心中无鬼何担心。

7 ■每个孩子都有一定的成长规律。因为个性气质、知识经验、心理特点等方面的不同,成长速度有快有慢。人们无需做“揠苗助长”式的努力。一些家长不问具体情况,亦缺乏因材施教的思想,凡是培训班都上,凡是教辅书都买,恨不得马上把孩子打成一个天才。他们处处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比,务求孩子“步步领先”,结果反倒让孩子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6月1日《人民日报》,原评人:张健)
——别削格为祖父母了才找回这种“孩子气”。

清官毓贤缘何未称好官

本刊特约撰稿\周英杰(山东烟台 资深传媒人)

晚清时期先后入河南巡抚吴大澂、山东巡抚张曜幕府的奇士刘鹗先生,可能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公开站出来非议弥漫于中国人精神深处的“清官情结”的有识之士。在他的名作《老残游记》里,刘鹗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基于此种认识,刘鹗以自己在山东官场的亲身经历为基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集“清官”和“酷吏”于一身,颠预妄作,以杀戮无辜邀取“才能功绩卓著”虚名的艺术形象——玉贤。而其真实原型就是时任山东曹州知府的毓贤。

毓贤,字佐臣,内务府汉军正黄旗出身。他本是一个监生,后来靠着捐官的办法获得了“同知府”的身份,并很快得到了实缺,先后担任山东省曹州知府、山东按察使、山东巡抚、山西巡抚。关于毓贤此人,晚清民国间的文人许指严在《十叶野闻》中有专门的一节叫做:“毓屠户”,并对其有一段极为精到的评论:“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迹其生平,无他能,前半生殃民,后半世召侮。”

说到毓贤这个人,首先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他是中国人眼中的一个十分标准的清官。他在清末的官场上曾提出过著名的“三不主义”,即:“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实事求是地讲,除了“不要官”这一条有些不符合实际之外,其他两条他大抵还是做到了。

那么,毓贤到底清廉到了什么程度呢?《十叶野闻》说,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消息传到山西之后,毓贤已经明显地感到他怙恶支持义和团野蛮排外的恐怖主义政策已经穷途末路,于是就想遣散那些在山西的义和团员。义和团的大师兄们虽然答应解散,但还是想最后要挟毓贤一把。他们提出来,是否可以给予一定的“遣散之资,令兄弟辈各寻生活”。毓贤告诉他



“为当清官,俺从不贪,闲事不管,好事不干。”

们:“吾服官以来,清刚自矢,别无藏馥余财,可以为诸英豪壮行色。无已,吾惟有散衣数箱,尔辈向质库取银,作川资何如?”说完,“命从者出箱示之,皆破烂不堪衣着之物”。巡抚如此之贫,令本想大捞一把的义和团首领大感意外,不由得赞叹:“公真清官也。”

毓贤是清官,同时更是晚清时期最有名的酷吏。许指严将他称为“毓屠户”,当不是激愤之语。毓贤出道之始,任山东曹州知府,以“善治盗”著称。其实,他的“善治盗”,就是中了“乱世用重典”的余毒,在地方上搞严刑峻法式的恐怖主义政策,滥杀乃至虐杀无辜罢了。毓贤在曹州的所作所为,《老残游记》中有生动的描写。刘鹗所写的这一切均可在晚清的一些史料中得到参证。据说,他在任曹州之后,不到三个月就处决了2000多人!按一些笔记作者的说法:其中有九分半是良民。

正如《老子》所云:“民不畏死”。毓贤的苛酷激起了曹州地方的教起民变不说,他自己也承认“盗风仍未绝迹”。实际上,他的嗜杀不仅不能治盗,反而逼着那些真正的盗贼图谋“变身”。他们迎合李秉衡、毓贤等仇恨

西方世界的特点,改以练习神拳为名,打出“灭洋教”的大蠢行劫掠之实。这就是日后给中国造成巨大震动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滥觞。

庚子年春夏之际,毓贤一味鼓噪“义和团民心可用”,极力主张清廷的激进派向11国宣战。在担任山西巡抚后,他积极执行“仇洋灭洋”的极端主义政策,鼓励山西省的义和团滥杀外国人和一切与“洋”字有关系的中国人,并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原大屠杀”。

毓贤极端仇洋人,但对于洋人他其实是色厉内荏的懦夫。当义和团导致了八国联军的武装干预后,他一再上书,讲些纸上谈兵毫无意义的大话,并表示随时率领义和团“勤王”。但内心里,他对洋兵怕得要命,迟迟没有动作。最后,才在朝廷的一再催促下起兵东进。而此时,联军已经攻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正在“西狩”的途中……

实际上,像毓贤这样的一个祸国殃民的人自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最后只能成为清王朝庚子年“大发瘟症”之后的牺牲品。1901年2月22日,毓贤在流放新疆行至甘肃兰州时,被清政府追加刑罚,就地正法。应当说,这样的一个人有此下场可谓是死有余辜。但正因为他有“清官”的虚名,所以死前在兰州民间激起一片同情的浪潮。近人柴萼在《梵天庐丛录》说:当时,很多人张贴告示,主动组织起来向朝廷请命,要求对毓贤免死。据说,兰州民间还有人在死后为他修建了祠堂,后被清政府下令拆除。由此可见,清官在中国民间的号召力实在到了“一俊遮百丑”的地步。

其实,在专制的清王朝,虽然百姓做着清官梦,幻想依靠清官救世,但无论是清官还是贪官都是不能真正利国利民的,他们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史海钩沉

加“杠杆化”应拒绝GDP导向

文\马光远(经济学博士)

与欧美在金融领域的“去杠杆化”不同,中国正在通过加“杠杆化”的经济刺激政策,意图实现经济的复苏和结构调整。政府的这种刺激政策,本身的确值得赞许,无疑,这比政府全部直接投入对经济的带动力要大很多。特别是在储蓄率居高不下,意味着民间投资的潜力极为巨大,政府通过加“杠杆化”的政策,一方面撬动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又能够避免对民间投资的挤压效应。因此,加“杠杆化”的政策在当下的语境中,其积极意义是多元的。

然而,实事求是地考察之前政策的实施效果,却并不如预想般乐观。第一,民间投资的意愿依旧不强,目前正在建的4万亿元的项目,基本上成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二人转”,民间投资鲜有介入的冲动和意愿,在地方政府财政紧张、资金配套不到位的情况下,4万亿元的刺激效果必将大打折扣;第二,居民的消费意愿依然不强,从前四个月对GDP的贡献看,投资依然居功至伟,消费虽然有所增长,但增幅明显低于同期;第三,货币政策虽然目前处于史无前例的宽松状态,一季度货币投放近5万亿元,但在企业去库存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这种“抢跑”让一部分资金流向了股市和楼市空转,并未进入实体经济;第四,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结构性减税”有沦为政策“白条”的可能,税收机关在增收的压力下,可能冲抵减税政策的“杠杆效应”,进一步恶化企业的生存状况,延缓企业复苏的步伐;第五,关键改革进展迟缓,比如在垄断领域,民间投资进入的难度依然超乎想象,进一步削弱了政策“杠杆”的带动力;第六,民生工程的政策力度低于预期,4万亿元投资中用于

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高达37.5%,资金规模1.5万亿元,而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的投资只有1500亿元。

毫无疑问,就人类对经济危机的认识和治理而论,我们早已经超越了“无为而治”的阶段,那些认为政府在经济危机中什么都不做的论调,不过是早已为时代所抛弃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招魂而已。而且,就中国经济的禀赋而论,没有政府的加“杠杆化”政策,恐怕很难让经济体自身完成转型和调整。加“杠杆化”政策的效果不理想并非政策本身之错,错在确立了一个以GDP为导向,而不是以结构调整和民生为导向的终极目标。

而正是这种以GDP增长为终极导向的定位,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政策的实际效果。既然要保增长,则政府的公共投资必然成为当仁不让的“男一号”,政府投资不要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压已属万幸,遑论撬动作用;既然要保增长,中央和地方财政就不能大幅滑坡,通过减税杠杆挽救困境企业就不会有实际行动;既然要保增长,就不能让房地产等带动力很强的产业按照商业周期进行调整,支撑高房价就成了政府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既然要保增长,就会推迟打破垄断等关键领域改革的步伐;既然要保增长,社保等民生领域的工程势必成了点缀和安慰性的举措。

笔者认为,在这种以保增长为终极目标的价值取向,“杠杆”的实际带动效果至此,自是意料之中。单从带动力评价目前的政策,的确不能算成功。特别是,在财政增收困难、地方财政配套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这种加

“杠杆化”将大大增加中国银行系统的风险。其实,如果分析一下目前各种政策“杠杆”的终极目标,比如,调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意味着银行将成为本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最大的买单者,而在房价依然没有调整到位、房地产的调整周期延续的情况下,这必将进一步将房地产的风险叠加到金融系统。由此,笔者建议调整以GDP为导向的政策取向,加“杠杆化”的政策不能仅仅限于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意义不大的GDP增长,而是应该立足于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立足于就业、消费和民间投资的启动上,加“杠杆化”的政策应该是改革导向、民生导向和转型的导向。否则,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本来幸免于难的银行等金融系统可能成为“杠杆化”的牺牲品,导致金融风险。建议——

涵养税源,坚持更大力度的结构性减税,给企业以喘息之机,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可以给予一年的减免税措施;

下猛药撬动民间投资,靠央企等可以拉动投资,但吸纳劳动力有限,而撬动民间投资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因此,必须将反垄断提高到国家基本政策的高度;

真正实施富民工程,通过收入分配的第三次改革,将沉淀的社会财富通过一定的途径回归民间;

下狠心解决社保等问题,10万亿元的社保缺口一日不弥补,内需就很难真正启动;

与过于依赖房地产的畸形产业结构诀别,一个靠房地产、垄断企业和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体长远来看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再表现出无奈,更不能讳疾忌医,不利用这次全球经济衰退的时机下决心优化产业结构,恐怕到将来更难摆脱房地产对经济和银行

天下思想

下基层\约研